

理想藏书



最佳读本

拨开重重迷雾 直击历史真相

历史悬案

真相娓娓道来 秘密层层揭开
全方位感受人类文明
零距离接触真实历史

大全集

读史可以明智，前提是这个历史必须真实。而历史上许多细节真相被掩盖了，形成许多悬案。现代文明中，人们需要知道这些悬案中各种“记载”不详的历史，更要知道被遮蔽的“客观”历史细节的真相，让被歪曲颠倒的历史面貌复原，让被封存的证据得以再现，让历史遗存得以重新认识，得到新的阐释或评价。在破译这些历史悬案的过程中，人们可以鉴往知来，提升智慧。

杨红林 翟文明 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拨开重重迷雾·直击历史真相

历史悬案 大全集

(第四卷)

常州大学图书馆
杨林 王文明 编著
藏书章

中国华侨出版社

郑和下西洋之谜

1405年，明成祖委任35岁的郑和为正使总兵太监，以钦差的身份，在7月11日那天，率领水手、翻译、医生、护船的兵士共2.7万余人，乘宝船62艘，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开始了第一次西洋之旅。当年秋，郑和船队经过长途航行，载着爪哇等国的朝贡使节和数十船朝贡贸易换回的异域珍品，完成处女航，载誉归来。此后，郑和率领着庞大的舰队又进行了6次西洋之行，历经亚非几十个国家。

郑和的远洋之行，为亘古未有之壮举。但是，由于时代久远，加之郑和下西洋的相关资料莫名被毁，致使许多关键性的问题竟成了扑朔迷离的难解之谜。

为何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这样规模浩大的远航，究竟是为了什么，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呢？后人对此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猜测甚多，却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最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我们知道，明朝建文帝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就以“清君侧”为名，大兴“靖难”之师，公开反叛。于1402年率军攻破南京城，颠覆了建文帝的统治。但是，当其带兵冲进皇宫时，只见宫中大火冲天，建文帝不知去向。《明史》对此记载：南京陷落时，“宫中起火，帝（建文）不知所终”。明成祖疑其逃往海外，为了长治久安，防止建文帝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便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寻找建文帝的踪迹，以消除政治隐患。《明史·郑和传》也清楚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自此以后，附和其说者不乏其人，一些历史学家比如范文澜、吴晗等在自己的著作中也都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也写道：“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

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

这就是郑和出使西洋的真正目的吗？后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有人说这种说法很可能是明代中后期封建文人囿于狭隘的思想观念得出的结论，中国明史学会名誉会长刘重日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明成祖无疑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既然朱棣在只有几千部卒的情况下都不怕建文帝，怎么会在大权在握时怕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呢？”，“再说也没必要为一个失踪的人费这么大的劲啊！”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毛佩琦教授也认为通使西洋是明成祖对外关系的一项大政策，可以认为朱棣命郑和在出海时顺道寻访建文帝的下落，但如果说寻找建文帝就是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是小看了明成祖的胸襟”。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那么郑和下西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郑和雕像

有人认为是为了耀兵海外，宣扬朱棣天下观。《明史·宦官传》记载：郑和“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遍历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摄之”。据此有人认为，明成祖心高气傲，一心想超越前代帝王，建立不世伟业，把文治武功永垂史册，所以才派郑和“耀兵异域”，显示中国富强，满足自己“天朝上国”君主的虚荣心。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书中云：朱棣富有雄心壮志，想通过扬威壮举，达到震慑与笼络海外诸国受封之目的。李长博在《中国殖民史》书中也称郑和下西洋之动机是“耀兵异域”，别无他意。

可是，下西洋的原因就真的这么简单吗？有人通过明成祖向西洋诸国颁布的诏书，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郑和西洋之行主要是为了推行朱棣的“天朝礼制体系”。其诏书是这样说的：“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

尔等祇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大意就是说：我奉天命，君主天下，施恩四海，不希望四海有流离失所之人。故特别派遣郑和告诉大家，我的想法，我的这番意图。你们要遵守天道，安守本分，不能恃强凌弱，要和睦相处，共享太平之福。一些专家认为这份诏书正体现出了明成祖自己对于天下秩序的设想，也就是他的天下观，他的理想的世界秩序，也就是希望在自己的主持下，建立一个各国之间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共享太平的和谐世界，或者叫国际秩序。后人将其称为“天朝礼制体系”。毛佩琦教授以及当代明史研究专家郑一均都支持这种说法，认为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儒家的天下观：天子受天命统治中国，覆载之内不论远近，大家一律平等，不能够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不过，这一看法明显带有拿现代人的观点衡量古人的意思。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吗？此说也不为定论。

还有人论证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打通海上通道，发展海外贸易。中国周边的国家大多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由于南洋诸岛与大陆地理分散，交通不协调，受到海洋空间的限制，缺乏进一步联系的基础，因而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为了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经济交往为纽带，将分散于大洋中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结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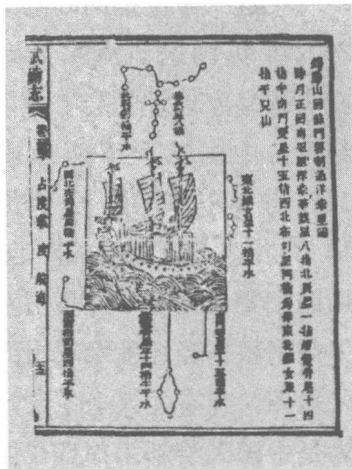
但是这一观点遭到了普遍的反驳。明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教授认为郑和的航海并没有贸易的成分。他指出，当时郑和所带去的物品主要是为了实现朝贡关系，郑和代表中国皇帝接受当地国王的朝贡，并代表皇帝把礼品赏赐给那些国家，他带去的东西主要用于赏赐，而不是做生意。并指出：“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明朝方面是非常不合算的，所收到的朝贡礼品很少，而赏赐的东西非常之多，常常是用数倍的礼物回赠给臣服的各个周边国。”下西洋“主要是政治行为，贸易是附加的”。他还特别指出，夸大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活动，就是歪曲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朱晨光在《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一文中也认为说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是一叶障目之见，因为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毛佩琦教授也认为：“这种说法是

用现代的经济观念，来解释古代人的行为。特别是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没有必要寻求海外的市场，它不是后来资本主义积累时期，希望通过海外贸易发展自己的商品经济，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说简单地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也是不确切的。”因而此说显然不能服众。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又有经济意图。韩振华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和陈得芝在《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3期的《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以及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等书中均认为郑和下西洋既有政治目的，又有经济意图。这种观点认为朱棣夺取了侄儿的帝位，自知名声不佳，便派遣郑和出使西域，耀兵海外，造成万国来朝的胜景，彰显自己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同时安抚或镇压逃亡海外的将士和臣民，宣扬国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开拓通往西洋诸国的海上航道，扩大官方贸易，用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换取海外的香料、补药、奇珍异宝等物品，以满足王公贵族的奢侈之需。正因此，郑和率领的船队被称为“宝船”或“西洋取宝船”。这种说法比较全面，但是如前面所述，贸易并非出使的主要使命，下西洋也根本不是为了赚取利润，一些皇室用品也只是顺道买回罢了；从政治方面看，如果真是为了安抚逃民，迎接各国来朝使节，有必要大张旗鼓，在28年间屡下南洋吗？所以此说也有人质疑。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郑和七下西洋各有目的。尚钺在《中国历史纲要》认为，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是为了“联合印度等国抄袭帖木儿帝国的后方，牵制帖木儿帝国继续东侵”。后六次，由于帖木儿帝国的危险消除，则主要是为了开辟一条新航海路线，以便与国外进行贸易。李光壁的《明朝史略》进一步指出郑和首次西下带有扩大贸易、提高“威望”、联络印度等国的三重任务，后六次主要是为了通商的目的。郑鹤声、郑一均在《郑和下西洋简论》中认为，郑和前三次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和东南亚、南亚沿海诸国建立关系，维护国际和平局势，提高明朝的威望，附带解决“疑惠帝亡海外”的问题。后四次主要是向东亚以西的更远的地区前进，开辟新的航道，让从来不与中国往来的海外之国“宾服中国”。刘重日先生也有类似看法，认为第一次下西洋是明成祖为

了与更多国家和地区交流、结好，宣扬“天朝上国”的优越性，其后的几次是为了加强联系，并进行通商，当时，各国使节和商人来华朝拜进贡的渐多，为了能让她们安全回国并进行进一步交流，明成祖就让郑和进行了第五次和第六次远航。而第七次远航，则是宣德皇帝命郑和出行的，他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延续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由此可以看出，七次远航的目的都是为了与各国交流以及进行商业贸易，只不过每次的具体目的略有不同罢了。但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该说也不为定论。



郑和下西洋所用的航海牵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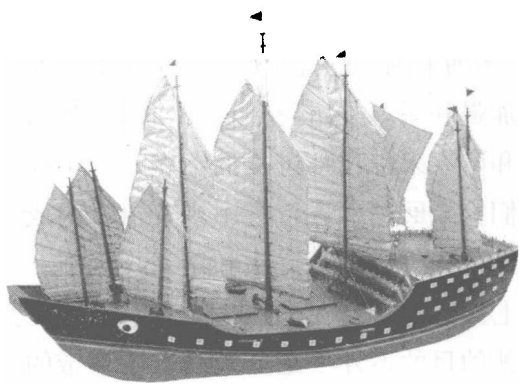
总体说来，以上各家之说各有道理，并且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对郑和出使西洋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甚至明显赋予了一种时代性的看法。可是到底哪种说法更符合历史真相呢？目前尚难定论，仍需进一步探讨。

郑和船队最远到了什么地方

大海浩瀚，航者无疆。那么郑和下西洋，最远到了什么地方呢？究竟如西人所说，深入大西洋，发现美洲，到达南极？还是仅止步于非洲东岸呢？

对于这个问题争论很大，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各执一词，根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英国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引用地图学家弗拉·毛罗所言，认为15世纪初郑和船只已经绕过好望角。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非茨拉德在发表的《是中国人发现了澳洲吗？》一文中，认为郑和的船队很可能到达了澳大利亚西北的达尔文港，因为1879年曾在那里出土了一尊中国寿星石像，为明朝遗物。随后，马来西亚学者祖非加甚至认为，郑和船队最远到达了南极，也到过澳洲大陆。并具体指出郑和船队于1422年抵达南极大陆，之后途经澳洲大陆，返回中国。

把这一争论推向高潮的是2002年英国退伍海军孟席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做出的结论：中国郑和下西洋舰队1421年到达美洲，比哥伦布早70年发现了新大陆。孟席斯的主要依据是，在美国发现了一张根据经纬度绘制出的古代地图，经有关人士考证，认



郑和下西洋海船复原图

为是中国人绘制。并且在加勒比海还发现了一艘沉船，可能是郑和的航船。另外，在加拿大岛屿遗址的坟墓中发现了汉字，遗址中的居民有黄种人的基因。孟席斯的这一结论震惊世界，他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也成为最畅销的书籍。

但是对这些说法，中国学术界大多持否定态度。因为《明史·郑和传》和郑和助手马欢的著作《瀛涯胜览》中，都记载着郑和船队最远到了非洲东海岸木骨都束、竹步、麻林，也就是今天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带。并且在非洲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境内，考古发现了很多14、15世纪的中国古瓷。从事海洋地图研究的专家朱鉴秋认为：“这可以作为郑和航海到达非洲的有力佐证。”对于孟席斯的观点，毛佩琦教授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不是有多大可能，而是完全不可能。”对于那张地图，毛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方式不同于西方，在当时不可能出现根据经纬度绘制的地图，“因此孟席斯所指的地图根本就不可能是中国人绘制的”。对于加勒比海沉船、坟墓中的汉字、黄种人的基因，这几个证据，所有的中国专家都基本持否定态度，但也找不出具体反驳的理由。毛教授认为：“这些都是没有确凿依据的，无法考证的。”但是，孟席斯很自信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通过实地考察掌握了许多中国学者不曾见到过的证据，他认为“中国学者大多数都是在中国本地做研究、查资料，没有像我这样走出去，在欧洲、美洲、非洲等其他地方做实地考察和查阅资料。而这些资料中国的学者是看不到的。”孟席斯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学者的考证多源于史料记载，只是在故纸堆里找线索，难免会有很大局限性。况且，值得注意的是，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由大小船只百余艘组成，由于海风、迷失方向等各种原因，很有可能会有个别船只脱离船队，在大海中漂泊，并由此发现了澳洲、美洲，甚至南极洲，因为据载，有许多小船往往在船队回航几年后，才从西洋返回，这其中肯定也有许多船只不能返回，而在大海中漂泊，由此不能排除他们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新大陆的可能性。但是，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郑和船队最远到了什么地方，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证的难解之谜。

西洋之行为何戛然而止

郑和七次西洋之行后，大明帝国永远停止了航海的壮举，中国的航海史也由此而沉寂了数个世纪。而此时的欧洲却掀起了地理大发现的狂潮。所以，我们不禁疑问，郑和航海的壮举为何戛然而止了呢？

有人分析西洋之行停止的主要原因是耗资巨大，得不偿失，缺少经济动力。据史料记载，早在郑和第六次航海归来后，明成祖就命他驻守南京，停止远航，以减轻百姓负担。明成祖去世后，明仁宗继位，下发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下西洋诸蕃国宝船，皆悉停止”。直到1431年，朱棣之孙明宣宗心血来潮，想要恢复日益衰败的朝贡贸易体系，再现大明“万国来朝”的盛况，才命郑和进行了最后一次远航。1433年，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归途中病死，也宣告了西洋之行的彻底结束。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明确指出：“‘支费浩繁，库藏为虚’，是终止下西洋的直接原因。”根据史料显示，郑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对西洋外邦朝贡者的大量赏赐，损耗极大，仅白银一项，每年就要花费600万两，还不包括对出使西洋两万官兵的嘉奖。另外，由于船队携带巨额铜钱出国收购，导致铜钱大量外流，造成国内“钱荒”，严重消耗了国库储备。并且物价大幅度上涨，人们生活困苦。更可怕的是，数万官兵葬身大海，数不清的船只在海上漂流，直到实行海禁多年后，仍有船只陆续返回。明成祖去世后，反对西洋之行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明朝成化年间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就认为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而坚决反对再次出海。袁伟时教授进一步认为，郑和的西洋之行，与哥伦布等人的探险活动旨在掠夺黄金、白银、土地或其他

奇珍异宝完全不同，其目的是“宣扬国威”、“完全是政治挂帅！对中国来说‘何必言利’”。因此，西洋之行只是皇帝的个人行为，根本没有足以支撑的经济基础。

但是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郑和研究专家郑明认为耗资巨大，只是停止航海的一个借口，并非根本原因。他说：“封建制度和保守的思想才是实行闭海的主要原因，即使个别英明的封建统治者突破这个桎梏，在一定的范围里做出有声有色的事情，但是，最终封建制度是没有开放的态度，陈腐的保守思想也是不要求下西洋的。”他还举例指出清朝的国力远远超过了明朝，但是清朝皇帝并没有一个想到要下西洋，面向海洋开放。因而国家的经济对航海的影响远远没有那么大。由此，他认为从根本上说是农业帝国的土地理念打败了海洋理念，而郑和只是一个非常好的执行者和组织者，但不是决策人，郑和的去世对航海是有影响，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完全有人可以接替他继续航海。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朝中文官集团和以郑和为首的宦官集团争权夺利，宦官集团失败，从而导致航海事业也从此搁浅。

上面各种说法，均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是一面之词，究竟是哪种原因，或者是哪种主导因素，抑或是综合因素的作用导致了航海事业的结束，就不得而知了。

郑和航海档案被毁原因

郑和下西洋的官方资料，即当时称为《郑和出使水程》的海航档案（记载了郑和及其部属在将近30年间的7次远航的航海经验及机密史料），据传被明朝兵部官僚藏匿并销毁，不知是真是假。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们不免产生疑问，为什么要把那些宝贵资料销毁呢？以致后世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因为资料的缺乏而困难重重。

一般认为是明朝成化年间反对下西洋的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所为。因为当时普遍认为郑和虽然“宣威异域，普及南洋，为中国历史所未有，然以天朝大使，属诸阉人，褻渎国体，毋亦太甚”。刘大夏据此，又认为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是一大弊政，担心后人步郑和之后尘，便一把火烧毁了郑和出使西洋各国的详细资料。明人《殊域周咨录》一

书记载了此事，说明宪宗成化年间，有太监怂恿皇帝效仿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之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南洋的海图和相关资料。时任兵部车驾郎中的刘大夏事先把这些资料藏匿了起来。兵部尚书项忠索要无果后，责问看管档案的小吏。在一旁的刘大夏答道：“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谏也。旧案虽存，亦当之。”项忠无言，只好以散失复奏皇帝。明人顾起元在专记史事掌故的笔记《客座赘语》中也记载了这件事情。由此，“旧案虽存，亦当之”成为了刘大夏焚毁这些资料的重要证据。



郑和石碑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前祈求航海平安时刻立。

但是，藏匿资料和焚毁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刘大夏真的焚毁了这些资料吗？明朝法律对官员极为严酷，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官吏遗失“事关军机钱粮”的文书资料，不但要停发俸禄，还要承受残酷的杖责。

无意丢失尚且如此，刘大夏竟敢故意焚毁这些资料？而刘大夏为明朝中期重臣，先后辅佐四位皇帝，岂能不知明朝的律令。况且明朝正史中，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刘大夏焚毁资料的记载。《明史》中有刘大夏的传记，篇幅不短，也未曾见有焚毁资料的记录。因而，仅凭明朝私人书上记载就说刘大夏焚毁了郑和航海资料，后人难免会有怀疑。

甚至有的史学家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航海资料。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就认为，郑和下西洋也许根本就没有留下过什么航海日志，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这样的日志确实存在过。但是，海军少将、中国造船专家郑明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举例说，现在能看到龙江船厂志里写了八个字“海船已革，尺度无考”，很明显有被消除掉纪录的痕迹，显然是有人毁了资料。

那么，假如刘大夏没有焚毁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又确实存在过，它们又被谁焚毁了呢？对此又有不同的说法。如果刘大夏只是藏匿了这些

资料，不可能被带出档案库，它们应该还在府库之中。目前用于保存明清历史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有 3620 余件明史档案，但是几乎全部是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明初和中期的都荡然无存，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郑和下西洋的资料。

对此有学者解释：“明代档案所以保存不多，一因明清之际的战乱，二因清代乾隆帝时期修撰《明史》之后，按照当时惯例，对所依据的档案史料往往弃置甚至焚毁掉。”因此如果刘大夏把资料还保存在府库中，很可能毁于战火，或者被清乾隆帝朝修史时弃置或者毁掉。

要是这样，乾隆皇帝就逃脱不了焚毁资料的嫌疑了，但是，这一说法也缺乏有力的证据，只是一种猜测而已。这些资料究竟被谁毁掉了，是刘大夏，还是清朝修史时所为，恐怕是永远都解不开的历史疑案了。

明末三大悬案

明万历朝，因立太子一事引起了朝廷的激烈争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发生了有人持棒闯入慈庆宫、欲谋害太子的案件，震惊了朝廷内外，史称“挺击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万历帝去世后，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历史上称为明光宗。可是明光宗在位仅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随后明光宗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在短短两个月内，皇位一下子由祖父传到孙子手中，可谓明史之最。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从明光宗到明熹宗的皇位更替过程中，又相继发生了两个宫廷大案：“红丸案”和“移官案”。“挺击案”、“红丸案”和“移官案”，被总称为“明末三案”。由于“三案”发生在皇位递嬗和各方斗争的过程中，各种势力纷纷介入，使得案件因无法正常审理而变得异常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挺击案”的幕后主使是谁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正是端午节的前夜，太子居住的慈庆宫里的人们正沉浸在节日即将来临的喜气当中，突然，一个手持枣木大棍的男子出现在慈庆宫前。他将守门的老太监一棒打倒，冲进宫内，直奔前殿檐下，并拾阶而上，试图加害太子。这时，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与同来的七八名太监一拥而上，将陌生男子擒获，交由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第二天，朱常洛将此事禀告明神宗，得旨立即派人审查。于是，案子交到了巡城御史刘廷元等人手里。

联系多年来宫廷内部围绕立储一事而进行的明争暗斗，刘廷元等人隐约觉得此事干系重大，非同寻常。但是他们又左右不敢开罪，于是草草了案。将讯问的结果奏呈万历皇帝：闯宫的男子名叫张差，是蓟州

井儿峪人，经再三审讯，“本犯嗷嗷称吃斋讨封等语，话非情实，词无伦次，按其迹苦涉疯魔，稽其貌系黠猾”。就是说犯人说话颠三倒四，看起来有点颠狂，话里头经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但又有些狡猾。报告本身模棱两可，可以理解为犯人看上去是个疯子；又说“貌系黠猾”，似乎预谋不轨。而且认为：这样的案犯，应该严加审讯，从重拟罪；而刘只是个巡城御史，当然不胜此任。

于是，案子被推到了刑部。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人，深知该案发生得蹊跷，干系重大，而以郑氏与东宫的矛盾而言，审案稍有不慎，便会开罪郑氏。由此，他们便想就此了结此案，因而拿“稽涉疯癫”大做文章。初十日，他们上报了审问结果：张差是蓟州人，因当地刚开了一座官窑，一时柴薪走俏，张差变卖田产，收购了大批柴薪前往卖给官窑。由于



明神宗朱翊钧像

当地人李自强认为他抢了他们的生意，一把火把张差的柴薪烧光。张“日夜气忿，失态癫狂”，得了疯病，并于本年四月进京审冤告状。路上，受人欺骗说拿一木棍可以当做冤状。张差信以为真，拿着木棒，四处乱撞，最后打伤太监，误入慈庆宫。不知为何，前后两审的结果却不相同，前审中“吃斋讨封”的结论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纯粹“疯颠”的结论，就连狡黠的性格判断都没了。胡士相等人的处理意见是：按照法律，将张差立即问斩。

可是，此事早已传遍了宫廷内外，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纷纷，闹得满城风雨。人们推测，此事一定与郑氏一伙有关，说刘廷元、胡士相等人的审讯虎头蛇尾，有意包庇幕后主谋，郑氏无形中成为众矢之的。明神宗朱翊钧对外界传闻十分恼怒，在郑氏的鼓噪下，他下令刑部对张差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探望，想等到舆论平息后，再作处理。然而一些平时对皇太子的安危十分关心的正直官员们对刑部案情的判断也深为不满，慈庆宫虽然禁卫不严，但又怎么是一般人说进就进的呢，这背后肯定有隐情。刑部衙门中有一个叫王之案的主事，极

有正义感，他就抱着这种疑问，暗中探牢，巧审张差，结果再一次引起了轩然大波。

王之宬曾做过县令，颇有审案经验。十一日，王之宬带领一班狱卒为牢中囚犯散发饭菜，他故意留置了张差的饭菜，最后才送。饭拿到张差的狱室后，王之宬见张差身强力壮，神情紧张，决不像疯颠之人。于是，他命令狱卒把饭菜放在离张差一定距离的地方，对他说：“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久久低头不语。这时饭时早过，张差忍不住饥饿，小声说：“不敢说。”于是，王之宬命牢中其他狱吏回避，只留两名狱卒在旁，亲自对他进行审问。张差在招供中说：“我小名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乡人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名的老公，说：‘事成与尔几亩地种！’老公骑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铺，初四到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与我饭，后来又交给我一根枣木棍，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福大。”

到这里谁都看得出，张差棒击小爷（皇太子）是受太监指使的。于是，王之宬立即上奏，不但认定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还请求皇上立即准予朝审或由九卿、科道及三法司会审。

王之宬的奏疏引起了轩然大波。有敢说话的官员，如陆大受，就开始影射背后指使之人必有“奸魄”，暗示此事是郑贵妃之父郑国泰所为。而明神宗对王之宬及陆大受的奏疏，皆扣留不报。但是，舆论已经无法控制，宫廷上下，沸沸扬扬。大臣们要求查明真凶，彻底查清张差所说太监何人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奏章纷至沓来。而且有人指出，这个案子是危急太子生命安危的一种讯号，如果不查清，后患无穷，所以“务在首恶必得”。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此案的调查中来。御史过庭训通过蓟州知州戚延龄调查张差的为人，得到的结果是张差实属疯颠之人，大臣中间又有人想以“疯颠”二字定案。五月二十日，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原参审人员王之宬，再次提审张差。在这一审中，张差又交代了一些新的内容：“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儿峪居住。又有姊夫孔道住在本州城内。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大宅子，

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三舅、外父常往庞保处送炭，庞、刘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来，说打上宫中，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吃也有，穿也有。刘成跟我来，领进去，又说：“你打了，我救得你。”张差如是说。

原来是太监庞保、刘成主使张差棒击太子的。那么，太监为什么要谋害太子朱常洛呢？背后肯定另有隐情。由于庞保、刘成二人是郑贵妃的人，所以人们不禁把目光投向了郑贵妃。

审讯情况传出后，群情激昂，无法遏制。大臣们的上疏不断，其中多涉及外戚。大臣们并没有把矛头直指郑国泰，郑国泰却坐不住了，为了澄清自己，五月二十一日那天写了一个揭帖。没想到，此举让事中何士晋抓住了把柄。何士晋说：“陆大受疏内虽有身犯奸畹凶锋之语，……并未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辄尔具揭张惶，人遂不能无疑。”郑国泰可谓是弄巧成拙，不打自招，竟将自己卷入了案中。他的愚蠢之举同时也让郑贵妃陷入了麻烦之中，好在郑贵妃因为得皇帝宠，可以日夜向明神宗哭泣。碍于郑贵妃的情面，再加上明神宗本人也不愿让事态进一步扩大，就让郑贵妃去请求太子朱常洛的原谅。在太子面前，郑贵妃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求得太子的谅解，一再向太子下拜。太子为了照顾坐在旁边的明神宗的颜面，只好回拜，并原谅了郑贵妃。

五月二十八日，已经25年不见群臣的明神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带着皇太子、皇孙、皇孙女在慈宁宫慈圣太后灵前召见了诸大臣。

明神宗身穿白袍戴着白冠，面向西而坐，右边站着穿青袍的朱常洛，左边阶下并排站着皇孙、皇孙女四人。明神宗拉着朱常洛说：“你们都看见否？如此儿子，谓我不加爱护，譬如尔等有子如此长成，能不爱惜乎？”边说边让太监们将皇孙、皇孙女引上石级，“朕诸孙都已长成，还有什么说的！”

明神宗神态自若地对朱常洛说：“你有什么话，跟大臣们都说出来，别顾忌。”朱常洛道：“似此（张差）疯颠之人，决了便罢，不必株连。”又说：“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

父子俩简直在给“梃击案”定调子——张差所为源于疯颠，不要株

连他人。见此情形，大臣们也就作罢了。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凌迟处死。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将庞保、刘成处死，梃击一案就此再无从查起。

综观全案始末，郑贵妃为“梃击案”的主谋是毫无疑问的，否则，郑贵妃因何要拜太子？刘成、庞保又为何被秘密处死？然而，就是这已昭然若揭的真相，却成了历史上的一大悬念。

朱常洛死于红丸吗

“梃击案”以后，朱常洛的地位提高了不少，他在处理“梃击案”中的表现，深为万历帝赞赏。万历帝也觉得这个孩子已经长大，而朱常洛的几个儿女也给垂暮之年的他带来了几分欣慰和喜悦，因此对朱常洛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梃击案”中大臣们的表现，也使郑贵妃一伙看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意识到太子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由此，郑贵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并为以后打算，对朱常洛的态度骤然判若两人，倒一味逢迎起来，不时派人给太子送去金银



明孝端显王皇后像

曾抚养皇长子朱常洛长大成人，支持立皇长子为太子。

珍宝和美食酒饌，并选了美女送来侍奉太子。朱常洛有些受宠若惊了，因为长时间以来，朱常洛的生活都是不尽如人意的，突然之间有人可以讨好、善待自己，他怎么能消受得了，于是，本就荒唐的生活变得更加放荡。尤其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太子妃郭氏去世，朱常洛少了约束，行为更加不羁，结果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一，明神宗归西天之后，做了19年太子的朱常洛登上了皇帝宝座，次年改元泰昌。即位之初，朱常洛算得上是一个有为的君主，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事。比如，连续两次发内帑共计160万两，用来赏赐在辽东及北方的前线防军；撤回万历末年引